

行走中国丛书
主编◎张昌山 耿昇

SHIJIAN ZHI
HEN

NANFANG SICHOU ZHI LU LUKING BILU



时间之痕

——南方丝绸之路旅行笔记

周 勇◎著



云南出版集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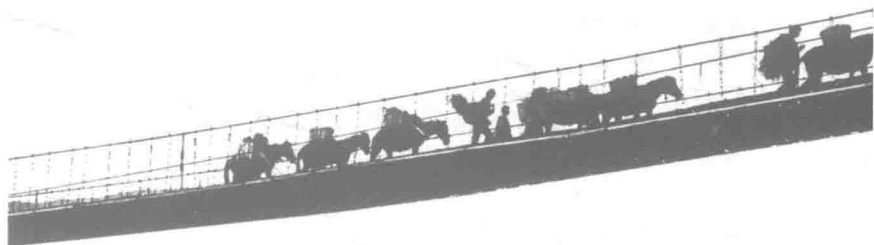
云南人民出版社

行走中国丛书
主编◎张昌山 耿昇

时间之痕

——南方丝绸之路旅行笔记

周 勇◎著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时间之痕:南方丝绸之路旅行笔记/周勇著. —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5.12

ISBN 978-7-222-13837-7

I. ①时… II. ①周…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66148号

出品人

刘大伟

项目负责人

赵石定

责任编辑:苏映华 姚实名

装帧设计:胡元青

责任校对:徐 霞 雷安平

责任印制:洪中丽

时间之痕——南方丝绸之路旅行笔记
周 勇 著

出版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编 650034

网址 www.ynpph.com.cn

E-mail ynrms@sina.com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18.25

字数 240千

版次 2015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刷 中国石化集团滇黔桂石油勘探局昆明印刷厂

书号 ISBN 978-7-222-13837-7

定价 39.00元

如有图书质量及相关问题请与我社联系

审校部电话:0871-64164626 印制科电话:0871-64191534



云南人民出版社公众微信号

总 序

张昌山

从黑格尔以来，传统中国长期被欧洲中心主义者视为一个“停滞的帝国”。这一观念出现几十年之后，国人终于认识到，中国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清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年），李鸿章在《复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中说：“臣窃惟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李氏又在《因台湾事变筹画海防折》中说：“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主客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数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李鸿章对世界和中国的这种认识还在多个场合说过。当时的中国，一下子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天下，迅速跌进五大洋、四大洲之中的世界，甚至只是亚洲东部一个落后的大国。

这数千年未有的大变局，就是以工业革命为主导的近代化及现代化，而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这一近代化及现代化过程，至今仍在进行之中。

百年间，一些中外人士行走在中国这片古老而又在变动的土地上。行走者中，既有外国的传教士、外交官、探险家，更有中国的文人、学者、科学家、商人、军人，甚至有家庭妇女。他们的游记、札记、考察报告、探险实录等，见证并记录了其自身行走的经历和中国近代化及现代化的过程。当时写下这些文字的人虽身份各异，目的不同，但每一部作品记录的都是作者个人的观察与体验，也记载了他们的所思所想和个性特征。

而不同的作品拼合起来，则在横向空间上似画卷一般展现了中国各地的风土人情和社会面貌，而在纵向的时间上则有如电影一样显示了中国在不同历史时期社会变迁的细节与大势。在他们笔下，中国不再是故纸堆中的陈旧记忆，而是活生生展开的现实景象。

把历史还原到现场和实际生活，这大概是每一个想了解历史的人的最大愿望。我们从这些作者在中国的行走、体验之中看到了一种活态的中国历史，它们明显区别于以往的正史和官方档案之类的文献资料所记录的静态中国历史，而且，人生的丰富性、视角的差异性及社会的多元性，也尽在其中了。

德国学者赫尔德所倡导的“同情之理解”，作为一种历史研究方法，在中国学者中以陈寅恪等用得最深也最好。如今，我们把这些中外作者的各类作品作为历史文本来阅读、感受和研究，通过这些文本去体验他们在这片土地上的行走、见闻与思考，这也是一种“同情之理解”的实践。今天的人们可以从感受这些作者所体验的中国社会，从而更具体更深刻地观察了解中国近代化及现代化进程的艰辛与经验。

将中国放在整个世界大格局中来看，这一百多年的历史，大致就是摇摇晃晃、步履蹒跚地走向世界和走向现代的过程。鉴往才能识今和知来，但由于过去的观念、方法、习惯和经验等因素，有意无意地遮蔽和塑造了我们对于这段历史的认识与解释，因此，云南人民出版社推出的这套“行走中国”大型丛书，是在回头观看百年中国之动静，是在体会“我看人看我”的经验，其实质则是向前进，走向永恒的未来。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历史的洪流和时代的浪潮虽然可能会被拖延，却不可能永远被遮挡。司马相如曾说：“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异也。”李鸿章有言：“处数千年未有之奇局，自应建数千年未有之奇业。”这两句话的时间相差两千年，表达的却是同一种心声，谨抄录于此，作为我们对国家和时代的期许。

是为序。

2015年5月

序

陈 墨

有一个作家说，真正的作家，是那些经常不知道怎样写作的人，每一次写作都是一场冒险。这话有意思，近乎古人所谓“看山不是山”到“看山还是山”，其实也没那么难以理解：只不过是说文学创作和文书制作的区别。所以，在这本书第一章的结尾，周勇兄说他力不从心，说不知道自己能否像古道上的赶马人那样顺利抵达终点，这就不是谦虚，更非矫情，而是一个真作家的真状态。

2000年前让汉武帝惊奇不已的“蜀—滇—身毒道”，即从成都通往印度的古代南方丝绸之路，仅国内部分，就逶迤3000里，沧桑2000年，该如何书写？更大的问题是：这条古道从无完整史志，文献零星如凤毛麟角，古道真迹更已面目全非，“大地上残留的石头，是这个童话世界曾经存在的唯一证明”。即便只写古道末段，即从永平到中缅边境的永昌道，大地茫茫，千头万绪，从何说起？

处在不知所云的创作初始状态的作家，情况千差万别，有的发呆，有的发闷，有的发狂。周勇兄的通常办法是“发懒”，推迟起始，若无其事，懒散身心，伺机捕猎灵感。我不知道《时间之痕——南方丝绸之路旅行笔记》的具体写作过程，但不难推测，当他捕捉到“时间之痕”四个字，就掘开了灵感源泉。“时间之痕”是作者搜集素材的方法要领，也是“取巧”的理由，“此时古道所呈现给我的只是一个结局，它的过程藏匿在岁月里了。因此，我可以在事件发生的地点，推测导致事件结局的各种可能性”。既然古道时空无法完整再现，“局部”和“片断”书写也就理所当然。史料档案匮乏，作者不得不“后现代”：文献查抄、文物考古、口述历史、现场观察与记录，全都是碎片化的“时间之痕”，写作即碎片的拼贴与缝合。

且慢。我这样说，会不会让人误以为《时间之痕——南方丝绸之路旅行笔记》全是数据碎片，而作者只是个裁缝？这个请放心，周勇兄是个作家，最擅长的就是写人，深知“一条外表和其他山道并无区别的道路，由于有了人的故事，你就觉得它是独特的”。《时间之痕——南方丝绸之路旅行笔记》的重点，正是与古道相关的人物故事，包括历史传说中人、现实生活中人、作者本人。“行走在中国最古老的道路上，你会遭遇很多传说。这种史前的方式，似乎更适宜于讲述被隐匿在大地之下的历史。”而且“这类缥缈的传说比较接近创世纪一类的神话，比起那些我们熟悉的严谨而科学的史学著作，它们也许与人类的心灵、精神的历史更为接近”。口述历史的价值，首先是心理的真实。

《时间之痕——南方丝绸之路旅行笔记》的重点暨华彩篇章，是对生活在古道区域的现实中人的讲述。作者的独特贡献，是对古道人事进行了特殊的“时间”标注。你随时能遭遇这样的句子：“历史与现实只有几十米的距离。”“湾子的时间是缓慢的，甚至有时是停滞的。”“此时对于这个老人而言，时间似乎不是前进的，而是原在的，在开始之地原在。因而他的时间与我们理解的时间不是一个概念。”“老段可能不知道他将‘过去’和‘现在’的时间凝固在不到十平方米的挡土墙上。”“他在这个古老的渡口里退缩到时间之后，退缩到世界之外。”“犹如在时间的源头，眺望时间向别处流动。”“大盈江两岸陈列着两种不同的‘时间’。”书中让人感慨唏嘘的人生故事，是当下的人文风景，也是“时间之痕”的直接证据。

作者本人也是这部书中不可忽视的重要角色，担任了古道旅行者、采访人、观察家、记录员和画外音等多重任务，他观察历史、体验历史，也参与历史，甚至激活历史，并将古道历史书写归档。而“时间之痕”，正是作者体验古道、思索古道的独特方式，以此形成这部书的深度框架。书中随时可以读到诸如“道路的历史，其实就是人类的历史”；“道路对于土著民族而言，无疑是一场深刻的‘革命’”；“在这里人们的生存一直被道路规定着”；“现在的一切其实都是最简单的道路延伸的结

果”；以及“对于历史，古道有着它自己的版本”；“这个时候，我似乎触摸到被凝固的岁月和时间”；“这是一个令人在时间上恍惚的地方”；“在古道上行走，时间不是向前，而是不断地倒退”；“我相信我和我出发前的世界并不处于同一‘时间’”；“我们或许能够回到人类文明的源头，与已经消失的历史重逢”……这些应能证明，对“存在与时间”的思索，非海德格尔的专利。周勇兄对古道历史的形而上唠叨，使得这部古道巡礼，具有非凡的哲学深度。

说到作者，我还有一点补充。周勇兄温柔敦厚，笑容质朴纯真，但有一点古怪，无论怎样不亦乐乎，这家伙的笑容从未绽放过百分之百，幅度分明有界，界外犹有余地。“余地”间的表层信息很容易阅读，该兄羞赧谦和，部分来自天性，部分来自文化教养。深一层有苦涩与忧郁，也不难理解，关乎身世，尤其是童年心理创伤。最深层还有惶惑和恍惚，我猜想，那是自我觉知的恐慌：骨子里灵气狂放、野性不羁，为适应社会，不得不对灵性泉流时而堵截、时而疏导，欢欣惊惧凝滞，遂哭笑难分。按周勇兄本人的说法，这表情，不也是时间之痕？

我说过他懒散，这是他养育灵感的技巧，也是他的文学风度。看起来懒懒洋洋、散散漫漫、随随便便，笔下文字却能别出心裁、精准生动，而且韵味悠然。这部书中写及古道苍凉和人间悲欢，无论怎样浓情厚谊，一律轻描淡写。翻遍全书，也只有一句重话：“我们总是乐此不疲地‘寻找’，却无视保护。”

云南人民出版社要再版《时间之痕——南方丝绸之路旅行笔记》，周勇兄命我作序，要我在这曲人间天籁之前，加上这么个小小补丁。我没有说不，是因为我曾多次跟他行走永昌古道，第一次随行距今已有25年。虽然他知道的我不知道，他看到的我看不到，他写出的我写不出，毕竟有许多共同记忆：往日崎岖还记否？路上人困蹇驴嘶。



目 录

总序	张昌山	/ 1
序	陈 墨	/ 3
第一章 道路起点与终点的两个文明古国 身后的文明		/ 2
即将终结的古道		/ 10
第二章 蜿蜒于历史与现实之间的道路 一个与太阳有关的古镇		/ 14
消失了的土著民族		/ 21
历经高潮之后的杉阳古镇		/ 24
博南古道上的占卦者		/ 30
第三章 从博南山到罗岷山 行走在“过去”的时间里		/ 34
古驿道上的缥缈记忆		/ 43
兰津古渡口的辉煌与衰落		/ 55
老人与古桥：南方丝绸之路上的一个经典意象		/ 70
第四章 昔日通衢 平坡：永昌古道上的第一个驿站		/ 82
罗岷：一个天竺僧人的名字		/ 98
古风犹存的集镇		/ 105
长湾赶马人		/ 113
水寨最高统治者的身世之谜		/ 120



第五章 云南西部最早的“县城”

吕不韦后代居住的地方 / 126

在废弃的古迹边生活的人们 / 133

第六章 穿越怒江峡谷

从盘蛇谷经过的古道 / 142

烫习——怒江边的第一个驿站 / 148

在原始森林里穿行的驿道 / 155

第七章 散布在高黎贡山的驿站

江苴——凝固在时间岁月里的驿站 / 172

小平河驿——与古道一起逝去 / 178

大蒿坪——四十七年的繁荣 / 184

桥街与最后的木匠 / 190

第八章 界头——古道的尽头？

南方丝绸之路上迷失的文明 / 196

封存于最后的驿道上的中原文化 / 206

伊洛瓦底江上游的驿镇 / 213

第九章 最后的驿道

与河流一起蜿蜒的古道 / 222

九保——深入“夷地”的汉文化驿镇 / 225

滇西古道上最森严的宫殿 / 238

驿道上的最后的码头 / 250

通往罂粟之地的驿道 / 262

尾声：遥望异国丛林里绵延的古道 / 276



第一章 道路起点与终点的两个文明古国



从成都出发的南方丝绸之路，在云南横断山脉的高山峡谷中经过漫长的蜿蜒之后，终于抵达博南古道。此时这条著名的南方丝绸之路无论在时间上抑或是空间上都处于“黄昏”时分了，它已经进入了国内的最后一段。（周勇摄）



身后的文明

在一段相当漫长的历史时期内，云南在人们的印象里始终是一个闭塞保守、远离文明中心地带的地方。横断山脉隆起的高原，阻挡了生活在黄河沿岸的人们眺望云南的视线。与当时发达的中原汉文化相比，云南很像是一个处于文化边缘的“异类”，始终游离于以黄河流域为发祥地的文明之外。由于地理与交通的障碍，中原人或出于孤陋寡闻，或出于偏见，对处于化外之地的云南的想象，肯定是遥远与蛮荒的。“西南夷”的称谓，多少反映了当时人们对这片隆起的高原大地在认识上的固执与偏见。这种固执与偏见一直持续了很多年（当然西南夷并不单指云南）。这其实是中原汉文化中心论和“一点四方”的时空概念在作怪。

事实上，云南应该是中国版图上最早对外开放的地方，只是它的开放不是向内而是向外，向南、向西，沿着河流的引导走向印巴次大陆及中南半岛。这条被后世史家们称为“蜀—滇—身毒道”最初的开辟者，是生活在这片起伏不定的高原之上的不安分的商人，面对被无数条河流切割得支离破碎陡峭不已的高原，这些商人们显得毫不保守，他们用脚板在陡峭的高原之上踩出一条世界上最艰难的道路。只是我们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会对高原之外的另一个大陆有着如此狂热的激情？这种激情甚至似乎超过了与自己同属一个祖先的中原。从这条被后来的学者们称为“南方丝绸之路”的历史来看，生活在这片红色高原的人群似乎更热衷于与身后的印度商人们沟通。西南夷地域与中原封建王朝的最初的战争，也是因为道路而开始的，西南夷地域的部落头领们用战争来阻止沿着道路不断侵入的中央王朝的势力，可是他们似乎并不拒绝沿着身后的道路而来的印度洋文明的有形与无形的渗入。有一个最现成也是最省力的解释：巨大的商业利益的驱动，使他们成了古老的中国最早具有世界眼光的商人。

事实上这条被后世史学家称为“蜀—滇—身毒道”的古道，是一条



远古时就已经存在的东亚河谷自然通道。春秋之前，它是一条南北民族迁移、民间贸易的自然通道。战国之后由于商业的发展，这条古道逐渐演化为一條巴蜀商人秘密通商的民间“走私通道”。至少在公元前4世纪，便有驮着蜀布、丝绸、漆器的商队从蜀地出发，直达腾越与印度商人交换商品，或继续前行到达伊洛瓦底江上游，越过钦敦江和那加山脉到印度阿萨姆邦，然后沿着布拉马普特拉河谷再抵达印度平原。“窃出商贾”“无所不通”。印度和中亚的玻璃、宝石、海贝，当然还有宗教与哲学，也随着返回的马帮，进入始终被中原认为是蛮荒与不开化的西南夷地域。而此时中原正与强大的匈奴民族作战，加之航海业的不发达，因而著名的北方丝绸之路与同样著名的南方海上丝绸之路尚未开通。于是这条从西南通往印度的古道，便成了当时中国与外面世界的唯一通道。可是当时的中国统治者，对这条通向印度的民间“秘密通道”全然不知。这样的情形大约持续了约两百年之久。这一秘密的民间商道的发现始于元狩元年（前122年）博望侯张骞出使西域归来向汉武帝禀报了他在大夏（今阿富汗北部）见到蜀布与邛竹杖及蜀郡商人私下通商身毒（印度）、大夏的情形。此前虽然自秦朝以来的历代帝王们就已经开始大规模地经营西南夷道，然而他们只是想通过道路来拓展自己的疆域，从而更有力地控制那些处于版图边缘的封闭蛮荒的地域。他们并不知道在这条古道的身后，他们的臣民们早已与异域邻邦互通有无了。因而这条远古时就存在的民间商道，直至大探险家张骞出使西域归来后，才算是真正进入了帝王的视野。此后这条南方陆上丝绸之路，已经不再是一条秘密的民间通道，它开始逐渐成为一条由官方维修管理的“国际大通道”。

如今人们对道路已经有了很深刻的理解，没有人会拒绝道路抵达自己身旁。让道路更加宽阔更加通畅，最好是“高速”的，这是现在所有人的想法。拒绝道路在今天是愚蠢而难以理解的。然而我们今天的想法与当年西南夷地域的部落头领们的想法有着相当大的差距。他们对道路的理解似乎更倾向于政治上的考虑，虽然开道能给他们带来中原先进的物质文明，可是道路的开通对于这些少数民族部落首领而言，在失去封



闭的同时也将失去领地的独立性。道路将使他们封闭的部族权益遭受极大的威胁。于是阻道、杀吏成了土酋们反抗中央王朝最为普遍的手段。“辄杀略汉使”“夺币财”。用武力拒绝道路的开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是所有中国封建帝王们根深蒂固的想法，和平求道不行，当然只有求诸战争。元封二年（前109年）“汉发三辅罪人，因巴蜀士数万人，遣两将军郭昌、卫广等往击昆明之遮汉使者”，古道上于是开始了重演中国历史上并不鲜见的关于道路战争。战争的结果自然是强大的中央王朝沿着道路的开拓，将自己的势力一直延伸到南方丝绸之路国内的最后一段“永昌道”。有一首在当时广为传唱的歌：“汉德广，开不宾。渡博南，越兰津（霁虹桥）。渡兰沧（澜沧江），为他人。”如今这首具有汉代古风的歌谣在史籍里仍然随处可见。

其实在秦统一前，对西南夷道的开发就已经开始了。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公元前316年，蜀守李冰父子便开始修筑从成都沿岷江而下的道路。史称“犍道”。西南夷，是一个地域概念，它是秦汉时期对今天云南全境、贵州西部、四川西南部，以及缅甸、越南北部广大区域的统称；它也是一个族群概念，它是秦汉时期中原人对居住在这一区域内的夜郎、滇、句町、叟、昆明邛笮等部族的总称。《史记·西南夷列传》载：“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这说明在夜郎、滇、邛都等区域内已发展成为定居的农业文明（参见范建华著《西南古道与王朝开边》一文，载于《南方丝绸之路文化论》云南民族出版社1991年11月1版）。秦帝国建立之后便派常頌“开道置吏”，将西南夷置于秦王朝的统一之下。“常頌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常頌修筑了第一条由四川通往云南的官道——五尺道。从而达到“置吏”的目的。“五尺道”起于今四川宜宾，经高县、筠连入云南盐津、大关，经昭通、镇雄，折入贵州毕节、威宁，再入云南宣威，抵曲靖。“五尺道”是在民间古道的基础上，由政府组织修筑的第一条到达云南的道路。然而短暂的秦王朝只将五尺道修至曲靖便消亡了，“十余岁，秦灭”，



刚开通的官道又中断了，所置的吏也就自然废弃了。然而秦朝的开道置吏经营西南夷的办法，为后来的历代王朝所沿用。道路所及的地方，也就是历代中央王朝势力所及的地方。任何一个强大的王朝，总是要编织一张如同蛛网般纵横交错的道路图。道路像血管一样从中央王朝的核心辐射到所有的角落。这是一个中国历代从未间断过的现象。

真正大规模开发西南夷道，是在西汉王朝汉武帝执政时，其间三十多年的时间经历了两度兴衰。建元六年（前135年）唐蒙开南夷道，据酈道元的《水经注》载：“凿山开阁，以通南中，迄于建宁，二千余里。山道广丈余，深二三丈，其凿之迹犹存。”然而南夷道的开凿过于耗伤民力，唐蒙又用汉“军兴法”严厉镇压不服及不力者，引起了“巴蜀民大惊恐”，以及朝廷内一些大臣的反对。司马相如力排众议，并再“请以身先之”，亲自主持开通“西夷道”。此后以蜀郡成都为起点的由东西两路进入西南夷地区的道路全部凿通。《史记·平准书》载：“唐蒙、司马相如开路西南夷，凿山通道千余里，以广巴蜀。”然而开凿西南夷道的工程实在过于巨大，征发开道的士卒均为巴蜀之人，旷日持久的工程使巴蜀民众不堪其苦，纷纷要求罢西南夷，且西南夷土酋又数攻吏、阻道，“杀长吏、燔烧邑郭、剽掠百姓、骸骨委积、千里无人”。类似的记载在《后汉书·西南夷传》及各帝纪中俯拾皆是。朝廷内部又有以御史大夫公孙弘等人为首的“罢西南夷派”的反对。而当时汉武帝所面临的当务之急，是平定北方匈奴这个关系国家与民族存亡的大事。于是，“秋，罢西南夷”。自此，曾经轰烈一时的开凿西南夷道的活动便被搁置起来。

西南夷道的再度高潮是在四年之后，博望侯张骞出使西域归来。与第一次开凿西南夷道相比，这一次汉武帝开道的决心相当坚定，因为第一次开道不过是中国历代帝王头脑里根深蒂固的“一点四方”的心理作祟，即以中原“天子之国”为中心再向东南西北四方延伸。在这种中原汉文化本位的历史文化观中，“西南”不过是“一点四方”的某种扩展，这种扩展可以使汉武帝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的汉文化中心的心理得到极大的满足（其实几乎所有的中国封建帝王都概莫能外）。因而它可以被中断或者被搁置。而这一次就不一样了，因为此时开凿道路已经不仅仅是设郡置臣“扩展四方”的问题了，它意味着将要开辟一条直通身毒、大夏的国际通道。具有世界眼光的汉武帝表现出了一种要“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气概。他用军队作为先驱，强行开道，以通大夏。当他用武力将西南夷道通至滇西洱海地区时，他仍然始终如一地贯彻着他的通道大夏的既定目标，“通博南山，渡兰沧（澜沧）水，置嵩唐、不韦二县”，直至南方丝绸之路国内的最后一段“永昌道”开通。东汉明帝永平十二年（69年），设立了汉王朝开拓与经营西南的最边远的郡——永昌郡，也是南方丝绸之路上的最后一个国内、国外物资集散地。至此，西夷道、南夷道、永昌道连成一线，南方丝绸之路全线（国内）贯通。为了保证国际通道的畅通，汉王朝除了以军队做保证之外，还采取了一系列后继措施，其中比较重要的是在道路沿线设置邮亭、驿站，“移民实边”和“屯田”，将稠密的内地人口大量迁至边地，“徙死罪及奸豪实之”。如不韦县正是因囚徒秦相吕不韦子孙后人发配于此而得名。这种政府组织的大规模的人口迁移行动，实际上也是一次大规模的文化迁移，开通的古道仿佛一条文化的河流，中原文化通过道路源源不断地向云南边地流淌，也使云南陡然增加了许多外来人口。这些为数众多的外来人口虽然身在异乡，但他们的目光却永远注视着他们曾经生长过的中原。从此，这片遥远的“蛮夷之地”与中原，始有了一种无法割舍的血缘联系。而云南的本土文化也开始出现中原化或反化的痕迹。

一条原本隐秘的民间商道，在汉武帝穷兵黩武之后，终于成了一条被中央王朝控制的“官道”。于是这条古道不再是商旅们的专利。当然开通后的官道与原来民间的“蜀—滇—身毒道”并不完全一致。随着历代王朝的更迭、兴衰和时代的变迁，主干道的某些区段有所变更，并有支线逸出。然其总的走向仍然如前。

南方丝绸之路均以成都为起点，向南分为东西两条主道，其间虽有分支和穿插若干支道线，然而均是围绕着这两条主道，即“西夷道”与“南



夷道”。西夷道沿牦牛道而行，经邛崃、雅安、汉源，渡大渡河穿越清溪关而进入凉山，沿安宁河谷至西昌、会理，渡过金沙江抵达攀枝花，翻越川滇交界方山之后进入云南的永仁、大姚而至大理。因此道从邛崃至西昌段是西汉司马相如为经营“西夷”而开，故名“西夷道”，又因通过越西境内的“灵关”，故又名“灵关道”。

东道亦始于成都，沿岷江顺流而下，经眉山、乐山至宜宾，跨金沙江沿“五尺道”经云南盐津、大关至昭通，向南过会泽、东川而至曲靖，折而往西可至滇池以南的晋宁，尔后西行经楚雄、南华而抵大理与西道会合。东道系先秦李冰、秦代常頌和西汉唐蒙等先后开凿，故名“南夷道”。与西夷道一并合称“西南夷道”。西夷道与东夷道交汇于普棚驿后，一并合称“永昌道”。此后越过澜沧江便来到旧称“永昌”的保山，再越过怒江之后，便可有数条道路进入缅甸、印度、泰国等南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这条中国最为古老的道路是由西夷道、南夷道、永昌道三条主道构成。这三条道路在不同的时代，其名称亦有所不同。如西夷道在唐代又称“清溪关道”或“会同路”。东夷道称“朱提道”“石门道”。

在回顾了云南的过去之后，你会发现地理对于云南文化的影响是多么重要。云南封闭的地形使中原人不易深入，所以云南人长期保持自己的“夷狄”风貌。而且云南似乎从未有过大的民族迁移与融合，在云南这样80%以上的道路是崎岖的山路的情况下，像草原游牧民族那样东奔西窜不太可能。因而云南人似乎总是以默然的心态缓慢地向前发展，所以古代的云南人与现代的云南人除了服饰、文化稍有差异外，基本上是沿袭过去（尤其是在道路仍不发达的边远地区）。地理的阻碍使云南文化与中原文化有着明显的差异。因为北面的乌蒙山、横断山脉的阻隔，大大地削弱和延缓了自秦统一中原以来汉文化向云南的推进；并且由于多种多样的原因，云南与中原保持着不是治外、羁縻就是教化与被教化的关系。因而云南的文化自古以来就是一种边疆文化，也可以说是一种混合文化。云南是一个处于多重交汇的重要地带，是一个文化碰撞的特殊区域。